

## 彭泽益《广州洋货十三行》跋

章文钦

###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彭泽益先生，是研究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代史卓有成就的前辈学者。清代广州洋货十三行，是彭先生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潜心研究的一个学术领域。在本书最后编定的十二章和附录一篇中，大多原为独立成篇的专题研究论文，探索的重点为：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十三行时代的广州港口与腹地、五口通商与十三行时代的终结以及广州行商与种牛痘法的传入等。著者立足于历史学、经济学深厚的文献基础和理论基础，使本书成为梁嘉彬先生《广东十三行考》之后，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笔者作为研究十三行的晚辈，亦略述承乏本书整理校订的心得。

---

自1981年暑假起，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笔者，开始研究十三行的历史。作为晚辈，我先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聂宝璋、严中平、彭泽益和汪敬虞等几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前辈学者结下学缘，或深或浅，问学请益，互赠作品，通信通话，直到2014年，聂先生和汪先生皆以九十多岁的高龄辞世。

从20世纪4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到50、6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再到“文革”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是中国经济研究的重镇，聚集了一批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现实经济的研究和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史的研究，跨越经济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自1953年起主持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严中平先生，便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除了都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之外，热爱国家民族，以学术为命脉，淡泊清贫，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是这些前

辈学者共同拥有的高尚品德。

1987年，由于聂宝璋先生的推荐，笔者赴京参加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清代的商品经济”学术研讨会，并由经君健先生把笔者带到严先生家中拜谒，准备报考攻读他指导的博士学位，后来由于中山大学方面的原因未能如愿。严先生当时赠送的《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却成了笔者反复品读的一本十分珍贵的书，近日再读此书，又有新的收获。

此书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第一讲开头引用穆幅田先生《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一文所言，“突出的”优良传统有三，即“爱祖国，爱人民的坚贞气节；不重名利，不怕困难，献身事业的治学精神；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关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一条，穆先生文中有言：“不断地探索科学，勇敢地坚持真理，不随人俯仰，不任人方圆，不唯上，不唯书，这是我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宝贵品质。这种品质，难免招致锋芒毕露之议，惹出清高孤傲之讥，甚至带来贬官、杀身之祸，而他们仍然恪守不渝。”<sup>[1]</sup>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又为国家民族命脉之所系，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支柱；又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事业，必须寄希望于有志于学的青年学者，严先生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初衷有言：“新中国的胜利，引起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极大兴趣。1949年以来，外国所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远比我们的多得多。其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歪曲历史真相的。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当然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这是我对青年的一个殷切希望。”<sup>[2]</sup>

从聂宝璋先生和汪敬虞先生赠送笔者的著作，同样可以追寻到前辈学者对这种高尚品德的表述。聂先生《学者风范长存》一文，纪念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他的叔父聂崇岐先生，文中载崇岐先生谈治学态度，特别强调“易被青年忽视的是‘清心’。所谓‘清心’，是说清除杂念。诸如‘急功近利’、‘名利思想’等都属于杂念。因为有杂念就不能专心。不专心什么事都难作好，何况学术研究。为杂念所累，就难以在学术领域里自由驰骋，发挥自己的才智。凡有贡献的学者，大都是比较专心的。”<sup>[3]</sup>时下学风浮躁，甚至有把自己与声色货利捆绑在一起，却宣称在做学问者。这段看似寻常的

教言，正是一剂良药。

汪敬虞先生于1997年7月作五律《八十书怀》，抒写人生感悟，诗云：“赣水潮初涌，梁园柳渐鸣。西川斜日淡，北地暮云轻。头白谁堪老，书陈纸尚新。开门迎寂寞，投笔惜清贫。”结联二句原注：“古有投笔从戎，今有投笔从商，余无所从，唯惜清贫已。”汪先生的高足杜恂诚教授评此二句言：“一个学者所有的甘苦和成就，均可从这两句诗中寻觅。坦坦荡荡地回首人生，发现寂寞和清贫竟是读书人最大的财富。只有保持心平似镜、坦荡孤寂的心态，才能成就学术。”<sup>[4]</sup>

彭泽益先生之子彭弘世兄为彭先生作传，在结语一段深情地写道：“彭泽益最信奉的格言是：‘科学绝不是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他晚年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竭尽所有精力奉献给社会和社会科学事业。”<sup>[5]</sup>

彭先生所信奉和践行的格言，与严、聂、汪诸先生的教言，可谓同声相激，同气相求。

## 二

彭泽益先生原籍湖南常德，1916年生于安乡，1994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先生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42年毕业于。次年考入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专攻中国近代史，1945年毕业于，获硕士学位，留校任历史系助教。1947年初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中国近代史。1951年9月被中国科学院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专攻政治经济学。1953年毕业于，仍回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继续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参加筹办创刊《经济研究》杂志。

“文革”过后，彭先生于1979年7月晋升研究员。1981年5月，参加《中国百科全书》的编审工作，任《中国历史卷·清史分册》副主编。旋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指导教授。198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1988年，应美国学术交流会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交流，论学传书。1991年10月，国家为表彰彭先生对发展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特颁发荣誉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

先生自青年时代即有志于学，开始对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专门研究，研究领域包括鸦片战争史、太平天国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等。1953年以后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究，尤以明清手工业史（包括采矿冶金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货币财政史和广州洋货十三行等为重点。在 50 多年的治学生涯中，留下丰硕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和史料汇编五种，发表论文 60 篇。

学术专著和史料汇编包括：

1. 《太平天国革命思想》，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
2.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三联书店 1957 年初版、中华书局 1962 年重版，科学出版社 2016 年再版。
3.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再版。
4. 《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下册），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5. 《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萃》，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已发表论文较为重要或有代表性者如：

1. 《中英五口通商沿革考》，《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八卷一期，1949 年 1 月。
2. 《〈织工对〉史料能说明中国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吗？》，《历史研究》1958 年第 4 期。
3. 《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历史研究》1963 年第 2 期。
4. 《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5. 《清代前期茶叶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
6. 《中国经济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 年第 3 期。

从 1953 到 1983 年，以严中平先生为主持人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编辑出版了多达八种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并完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一卷书稿。1984 年 10 月，严先生为这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奠基性成果作一小结：“回顾从 1953 年到今天这三十年里，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参考的话，那只有一条，即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书。”<sup>[6]</sup>

历史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科学，她不同于文学的形象思维和哲学的逻辑推理。在中国，第一流的历史学者从不鄙薄收集整理史料的工作。彭先生的《中国近代

手工业史资料》，即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的一种，他主张在编辑资料时以历史年代的顺序进行认真比较和分析研究，“整理编辑材料的过程就是分析资料、研究资料的过程。”<sup>[7]</sup>

历史学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之分，缺乏专题研究基础的宏观概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彭先生在编辑《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时，运用“以结合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中心问题为原则，并使问题与问题之间大致保持一定的历史和逻辑联系。”这个编辑资料的方法，同样适合从专题到专著的历史著作编写方法。<sup>[8]</sup>

彭先生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对所研究的各个学术领域，总是在详尽占有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的基础上，对一个个有着历史和逻辑联系的问题，结合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最后形成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对清代广州洋货十三行的研究同样如此。

### 三

清代广州洋货十三行，是彭先生在长达近半个世纪中给予关注并倾注心血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然从开始留意十三行、粤海关和鸦片战争等与广州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学术领域算起，时间可能更长。业师戴裔焯先生 1934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关履权教授是他任两阳中学教员兼教务主任时期的学生。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承关先生告以，彭先生是他就读中山大学历史系时的同学。中山大学在抗战军兴，播迁云南潞江、粤北连县之前，校址在广州石碑，从本书对广州文献掌故、城市风物的熟悉程度看来，先生对十三行这一领域开始关注当在 1937 年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不久，是年梁嘉彬先生《广东十三行考》出版。

本书最后编定的十二章中，有七章原为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最早的一篇为第十二章《中英五口通商沿革考》，刊于 1949 年 1 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八卷第一期。最晚的一篇为第七章《清代各省以广州市场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与商路运输》，刊于 1993 年 10 月出版的《九州学刊》第六卷第一期。时间跨度为 44 年。而以晚年的成果最为集中，除上列一篇之外，还有为第十章的《广州行商倡导对外洋牛痘法及荷

兰豆的引进与传播》，原刊于1991年4月出版的《九州学刊》第四卷第一期；为第八章的《清代‘广州体系时期’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刊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而为第三章的《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刊于《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则为中年力作。

其他五章中，为第二章的《清初四海关期间对外通商的“把持包揽”与“公行垄断”》，原文名《清初四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的增补。其余四章，亦多为经过多年积累而在晚年增补或撰写定稿，如第九章《广州行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高利贷与债务纠纷》，笔者在1987年10月赴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清代的商品经济”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上、下篇），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2期，彭先生大概读过拙文，而有不同看法，如在本书《序言》所说：“广州中外商人之间，因商业信用、高利贷而形成的债务纠纷，也是重要问题，只谈广州行商对外商‘行欠’是片面的。”行欠即拙文所述的商欠。先生拥有1988年自美国寄来的新材料，又立足于原有深厚的文献基础和经济学理论写成这一章，其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显然可见。而拙文的写作，当年确实尽了最大努力，使尽浑身解数，并得到多位前辈学者的肯定，对此应有的态度，如蔡鸿生先生当年示教：“既要虚心，又要有信心。”

在十三行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就学术史而言，梁嘉彬先生的《广东十三行考》为奠基性著作，而彭先生的《广州洋货十三行》则为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下文拟从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十三行时代的广州港口与腹地、五口通商与十三行时代的终结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关于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彭先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本书第三章《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以及刊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作为本书第四章的《广州十三行续探》。《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起首便言：“研究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买办商人和买办资产阶级兴起的历史，不能不溯源鸦片战争前广东洋行商人即十三行商的历史，……究明清代广东洋行的起源问题，就成为研究近代中国洋行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清政府在不平定台湾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二十四年（1685）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二十五年（1686）四月，建立广东国内外贸易制度的具体措施，由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酌定义，由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分别“住”、“行”两种货税。“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赴（粤海）关部纳税。”<sup>[9]</sup>并将参加贸易的商行分为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金丝行”和从事国外贸易的“洋货行”两大类，清代广东洋行制度即从此开始，洋货行即十三行。著者在文中旁征博引多种中外文献，其中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六的《分别住行货税》文告为著者首次发掘引述，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考证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至于《广州十三行续探》一文的写作缘起，先是，在著者《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发表后不久，汪杼庵（宗衍）先生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发表《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一文，依据屈大均《翁山诗外》考证《广州竹枝词》的写作年代，从《广州竹枝词》第一首下联“白头老人不识雪，惊看白满越王台”之句，据同治《番禺县志》所载“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冬大雪”的记载，遂谓第四首“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作于二十三年甲子春天，是年即有十三行之名。其后续有著述重申此说。为此著者撰成此文，对此说提出质疑，考证梁廷枏《粤海关志》谓十三行“沿明之习”之误；并驳汪文据屈大均《广东新语》“东粤之货，……其出于琼州者日琼货，亦曰十三行货”的记载，而谓广州十三行起源于琼货之说，重申上文清代广东洋行制度起源于康熙二十五年，是年始有十三行的结论。

关于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本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第二章《清初四榷关期间对外通商的“把持包揽”与“公行垄断”》和第五章《雍正时期的粤海关与洋货行》。第二章原文名《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有较大增补。首先为四榷关设置地点辨证，考证出四海关设置的地点为粤海关在广州、闽海关在厦门、浙海关在宁波、江海关在松江，纠正粤海关设在澳门、江海关设在云台山一类说法的错误。进而考察四榷关设置后“把持包揽”

的特权商人，“公行垄断”与广州公行的建立。主要依据美国学者两部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著作，即马士（H. B.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和普里查德（E. H. Pritchard）《早期中英关系的决定性年代》（*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 - Chinese Relations, 1750 ~ 1800*）所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揭示英公司大班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广州的交易对手为最高官员的商务代表；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1702 ~ 1704年）在舟山、厦门和广州，则碰到持有皇家委任垄断与外船贸易的特权商人。而在广州，从粤海关监督到广东督抚或驻防将军等大吏，都把对外贸易视为利藪，也各自指派自己的商人操纵贸易，使对外贸易逐渐演变成“把持包揽”的垄断贸易，直到乾隆十年（1745年）保商制度建立以前。据英公司档案所载，康熙三十八年广州商人已形成一联合（Combination），至四十三年则称为广州公行（Co - Hong of Canton）或商人行会（Merchant Guild），五十九年（1720年）又建立一个新的联合，举行新公行成立仪式，议定行规13条。其后公行虽然屡设屡废，十三行垄断广州对外贸易的制度却一直保持下来。至于四港贸易量的考察，以广州港为第一；四榷关税收额的比较，亦以粤海关最为重要。

第五章《雍正时期的粤海关与洋货行》。关于粤海关与洋货行即十三行的文献，梁廷相《粤海关志》和故宫博物院《清代外交史料》等史籍中的记述是以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史实为主，尤详于嘉庆、道光年间。从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广州洋货行建立后的早期情况，相关著述着墨不多。著者根据清代钞档、《雍正硃批谕旨》以及《文献丛编》第十一辑《雍正关税史料》等中国文献，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西方文献互相印证，对这段历史进行考察。所用资料，文献价值最高的当属清代钞档。著者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序言》中说：“书中利用部分档案、题本、钞本等罕见史料，除在史料之末注明者外，均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所藏。书中史料来源，注明‘清代钞档’的，是指经济研究所钞自前故宫文献馆的清代档案，多为题本和汉文黄册；‘清代刑部钞档’也是该所录自清代刑部档案的钞件。”<sup>[10]</sup>与本章所用资料属于同一来源。

通过对中西文献的梳理印证，著者指出：雍正元年至二年（1723 ~ 1724年）间，粤海关关务改归广东巡抚等地方官兼管，七年（1729年）复设监督。关务人事的改革，



原为杜绝弊端；既经改革之后，又产生新的弊端，在行商中法定地、公开地出现所谓“行头”“总行”这类“垄断行市”的组织。“这些管理关务的封建官僚不仅得以从行商中指定自己的商人来独占对外贸易权，还利用他们来舞弊经商，垄断居奇，压制和排挤其他行商的商业活动，这种斗争不论是明是暗，都是相当激烈的，反映那些官吏被察问罪不断出现。”<sup>[11]</sup>

在行商中创立“行头”名色，始于雍正四年（1726年）管关巡抚杨文乾。他在洋货行中“金用六行”为“行头”，“又专用二行为耳目”。采取垄断行市和重税措施，使外商视广州贸易为畏途，行商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雍正七年粤海关复设监督，新任监督祖秉圭谕令洋货行设立“总行”，由众商举报殷商陈寿观（Suqua）、陈芳官（Ton Hunqua）、李秦（Chinqua）、黎开观（Coiqua）和陈汀观（Tinqu）承充，以垄断外贸行市，旋又将李秦、陈芳官二行革退，仍令陈寿观等四行总理，其后被两广总督鄂弥达、兼刑部尚书事务徐本题参，说设立“总行”是祖秉圭“听信洋行陈寿观商谋把持包揽，止委四大洋行，其余一概禁绝，不许开张贸易，一切买卖货物，悉归所委四行。”<sup>[12]</sup>祖秉圭终于成为雍乾间粤海关监督“以侵墨败”的一个典型，被查出侵欺钱粮一十四万余两，而被革职查办，雍正十一年（1733年）谕旨定为斩监候。而无论是依附于祖秉圭的陈寿观及其同伙，还是依附于督抚大吏的陈芳观等行商，既然各自凭借着一定的官势，难免卷入政治漩涡，陈寿观被新任海关监督逮捕入狱，陈芳观也因牵涉前任海关监督诉讼处境极端困难，最终两败俱伤，都被官员、胥役榨取一空，被迫退出广州贸易市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粤海关与十三行早期历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近十多年来，先后有陈国栋、黄国盛、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诸教授等中外学者出版了有关粤海关与十三行的著作<sup>[13]</sup>，进一步发掘中外文献，尤其是收藏在国外的档案文献，在粤海关与十三行早期历史的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彭先生的研究，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关于十三行时代的广州港口与腹地，本书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第七章《清代各省以广州市场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与商路运输》，原文刊于《九州学刊》第六卷第一期，1993年10月版，为彭先生晚年之作。笔者曾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外关系名著导读》的研究生课程近十年，以海上交通的名著为主；2010年起，承乏《梁嘉彬史学文集》整理校订之责，梁先生的研究领域，亦以中国沿海边疆史和海外交通史为主；近年又承蔡

鸿生先生示教：“不但要研究十三行的内部结构，而且要研究十三行的外部结构。”“一个港口城市，有无发展潜力，要看其有无广阔深入的腹地。”广州正因为有广阔深入的腹地，而成为二千多年长盛不衰的港口城市。

这一章通过对清代各省以广州市场为中心的商品流通与商路运输的研究，考察了十三行的外部结构以及广州港口与腹地的关系。清代各省对广州的商品流通，著者根据《华事月报》（*Chinese Repository*，又译《中国丛报》）第二卷和郭士立（C. Gutzlaff）《中国开放》（*China Opened*）第二卷的西文史料，编成《国内各省以广州为中心的商品流通情况表》<sup>[14]</sup>，展示21个城市和省份商品输出和输入的总体情况，特别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对外贸易市场的表现最为显著。

进而考察国内对广州的主要商路。当时的商货流通，大抵是沿旧有的驿传道的大路运输的。著者主要考察通往广州的两条商路，一条是由湖南湘潭经南风岭至广州，当时由汉口经湘潭等地的各省商货都是经由此输出入的，容闳《西学东渐记》（*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对此路曾有记载，南风岭英文作 *Nem Fung pass*<sup>[15]</sup>。另一条是以闽浙赣为中心通往广州的梅岭商路，自唐代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凿石开路，至清代一直维持着，官私行旅不衰。在清代，丝茶出口不准海运，多经梅岭商路运至广州；外国使团自京赴广，也须经此路行走。由此路细分，又有通闽浙商路，通闽赣商路和通浙赣商路，福建茶叶皆从这三条运路经梅岭输出广州。

笔者于此略有补充的是，当时的商路为水陆兼程，就南岭通道而言，越梅岭沿浈江经南雄至韶关，再沿北江至广州；南风岭一路属骑田岭商路，越骑田岭沿武江经乐昌至韶关，亦再沿北江至广州；都庞岭、萌渚岭和越城岭亦各有通道，沿贺江或桂江进入西江，沿西江经三水思贤滘进入北江，或沿西江出磨刀门，经澳门、虎门皆可到达广州。通过南岭通道，广州港口拥有连接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流域的广阔腹地，成为十三行十分重要的外部结构，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一章的第三至六节，分别考察商品运输与搬运人夫、商品运输形式；自运与承运，搬运人夫的来源与脚力，鸦片战争后通往广州商路的衰落与搬运夫的失业罢工。著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作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运输业，以船行、埠头、夫行、车轿行为组织形式，以船运、车载、肩挑、脚力为运输手段，承担了内地各省通往广州的商品运输繁重而艰巨的工作，通过《公车见闻录》、《江西政

要》、《南安府志》及《大庾县志》等地方志书和原始文献的描述，使当年活跃在这条商路上的人物一个个复活过来。而鸦片战争后广州商路的衰落与搬运夫的失业罢工，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十三行历史的终结。

关于五口通商与十三行时代的终结，本书的主要成果集中在第十二章《中英五口通商沿革考》，原文刊于1949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八卷第一期。虽然写成于著者研究十三行的初年，研究的却是十三行最后的历史。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又称《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香港为英国殖民地，以行欠、烟价、战费等名目支付英国巨额赔款，废除十三行商对广州贸易的垄断权，开放沿海五个港口对英通商。这是中国对外关系从传统的朝贡体制到近代的条约体制的巨大转折，从此中国进入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三年（1843年）实行中英五口通商，为十三行的历史画上句号。著者在这篇五万多字的专题论文中，运用大量中外文献，考察了中英《江宁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分析条约的要点；进而考察二十三年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的谈判经过及主要内容，揭示中英商务关系的条约基础和新商约下的通商制度的确立；最终以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五个条约商埠开辟的经过为结束。是为积贫积弱的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最初历史，又是十三行作为中国封建主权国家外贸体制之下的官商集团走向终结的最后历史。

同类关于十三行最后历史的考察还见于著者的两篇专题论文，一为《论鸦片战争赔款》，刊于《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论述鸦片战争赔款中的行欠、烟价；一为《鸦片战争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刊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论述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而及于广州旧行商。皆已收入《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一书，可以参阅。

其他各章，如第一章《导论：广州洋货十三行概说》，考察洋货十三行在当时人的称谓、沿变的轨迹及其同业行会“公行”组织。第六章《鸦片战争前广州新兴的轻纺工业》，根据中外文记载，考察了当时广州附近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而兴起的轻纺工业，包括制瓷、制茶和棉纺织业，制瓷和制茶属外销品加工业，棉纺织业则为依靠进口的印度棉花为主要原料，以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相结合，在广州、佛山一带形成颇具规模的新兴行业。第八章《清代“广州体系时期”中外商人之间的竞争》，考察了当年

广州商场外国商人之间、行商与非行商之间、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竞争。

又如第十章《广州行商倡导对外洋牛痘法及荷兰豆的引进与传播》，属于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专题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牛痘法的引进与传播。1995年，日本爱知大学田崎哲郎教授访问广州，赠送嘉庆十年（1805年）刊行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复印本及相关研究成果，并告以牛痘法当年由经广州赴长崎贸易的荷兰人传入日本，使日本的人口在50年中增加一倍。2009年笔者赴东京、长崎进行学术交流，有日本学者谓其说不无夸大，但牛痘法在中国和日本的引进与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至今仍然造福中日两国人民，则是毋庸置疑的。书中其他胜解，不能殚述，读者倘能细读，自有会心之得。

#### 四

2009年，笔者的十三行研究结集《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卷末有《跋：我与十三行研究的学缘》一篇，文中亦略述与彭泽益先生的学缘。这种学缘，同彭先生的及门弟子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就十三行研究的学术史而言，仍有必要略加论述。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十三行之初，笔者受蔡鸿生先生提示，细读彭先生高文《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学者关于十三行研究的重要成果，稍后又读了《广州十三行续探》一文。1991年，又读到《广州洋货十三行行商倡导对外洋牛痘及荷兰豆的引进与传播》。笔者将三篇论文复印合订一册，题名《广州洋货十三行》，不时展读。

1991年2月，笔者收到梁嘉彬先生的来信，在《广东十三行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十三行的起源。梁先生据16世纪葡人的记载，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广州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行）垄断着，遂谓十三行起源于明代，且与葡人入据澳门一事有关，其时海道副使汪柏立客纲、客纪于广州，客纲即官设牙行，客纪即牙行买办。在此之前，笔者又读到汪杼庵（宗衍）先生的《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一文，谓《广州竹枝词》第四首作于康熙二十三年春，其时已有广州十三行。<sup>[16]</sup>

就在1991年5月，笔者为编撰《澳门诗词笺注》，到北京查阅文献，由聂先生的入室弟子朱荫贵兄带领到北京西城三里河彭先生家请教，就十三行起源问题曾问及：“可不可以说，十三行的名称起源于明代，而清代广东洋行制度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创立？”这是将梁先生的观点和彭先生的观点联系起来的一种折中说法。彭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自信，认为康熙二十五年是十三行起源的正确年代，当场驳斥说：“你不要和稀泥。”到2009年，笔者在拙著跋文中写道，彭先生“著有《广州洋货十三行》，可惜书稿后来在出版社丢失。……我至今仍然坚持这种折中的说法，不知彭先生泉下有知能鉴谅否？（当年）临别时，彭先生送了一部由他指导的六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合集的新著《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彭先生去世已十多年，我至今仍想着，能否寻回他的书稿，整理出版？”<sup>[17]</sup>后来又听说，书稿仍然保存。

到2012年，又承蔡鸿生先生提醒：广州市委宣传部有资助研究广州著作出版的专项资金，可向北京方面了解一下，如能寻到彭先生的十三行书稿，即争取在广州出版。不久市委宣传部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资助研究广州的学术著作出版，笔者作为评审专家参加，转达蔡先生的建议，介绍彭先生书稿的价值，得到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晨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林中泽教授等各位专家的支持，由市委宣传部决定列入出版资金资助项目。遂通过已调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朱荫贵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封越健先生的帮助，与彭先生之子彭弘世兄联系，得到彭弘世兄的大力支持，立即寄来书稿，并委以整理校订之责。

本书定名，书稿原名《广东十三行续考》，但细读全稿，彭先生在《序言》中已言“本书不采用‘广东十三行’为题”，而章节目录多次采用“广州洋货十三行”或“洋货十三行”为题，正文中亦多次提及这两个词。加上笔者自2010年以来受梁承邨、承天先生兄弟之托承乏整理校订之责的《梁嘉彬史学文集》，第一卷为《中西关系与十三行》，下册即以《广东十三行考续编》为题。遂与彭弘先生商定：本书以《广州洋货十三行》为题。

本书的整理校订，笔者略仿1994~1999年梁嘉彬先生《广东十三行考》校订的体例<sup>[18]</sup>，以著者生前校订刊行的原文为底本，与书稿对校，引用的资料在条件许可时尽量校对原书，除改正若干排印错误，并将原来各自独立刊于不同刊物的论文，按照成书体例做技术性处理外，其内容和表述的文字尽量保持原貌；书中引用的西方文献，已译

成中文者尽量保持原貌，西文原文则尽量译成中文；书中出现的西文人名、地名、船名及书名，已译出的尽量保持原貌，新译出的在中文译名首次出现时附上西文原文，并加上（ ）号，而尽量与已译出者保持一致。书中采用的民国纪年，一律改用公历纪年，民国以前的历朝年号，在各章首次出现时附上公历纪年，亦加上（ ）号。

此外，近读聂宝璋先生《学者风范长存》一文，谓承叔父崇岐先生示教：“限于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及个人的种种条件，‘名家名著’中也难免碰上某些讹误或不足。匡其讹误，指出不足，不能算是‘吹毛求疵’，而是一种贡献。其‘名家名著’仍然是‘名家名著’，这就是‘瑕不掩瑜’。”<sup>[19]</sup>细读彭先生这部名家名著，其中亦有一些确须订补之处，亦仿校订梁先生《广东十三行考》之例，共加校注及按语十多条，署名以示负责，并期待方家、读者教正。其中如第七章第一节《国内各省对广州的商品流通》起首有言：“清初开港对外通商，最先设立四个榷关，广州即为其中重要的商港。乾隆二十二年（1757）取消四榷关，限制对外贸易，只有广州是中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sup>[20]</sup>实际上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是将自海路而来的中西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江、浙、闽三海关辖下的上海、宁波、厦门对东洋日本、琉球以及西班牙的贸易，陆路恰克图对沙俄的贸易照常进行，东南四海关长期并存，至鸦片战争后，江海关监督仍由苏松太道兼任，浙海关监督仍由宁绍台道兼任，显然沿袭清代前期旧例。彭先生所言，大约沿用前人成说，笔者亦曾受这类成说的影响。近年广州亦有讲十三行而夸大一口通商，谓其他口岸全部关闭；讲粤海关而谓一关独开，其他三海关全部关闭。这类成说或传言应该根据史实加以纠正，才是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态度。为此笔者加上“章文钦补注”一条。

彭弘先生在《后记》中说：“本书在学术上某些观点与章先生有不同之处。”可谓坦诚之言，其中有关商欠及十三行起源问题已如前述。又如行商、买办的研究，笔者受聂宝璋先生《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和汪熙先生《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的影响，将19世纪洋行买办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中西贸易的行商、通事和买办，阐明十三行时期的买办与鸦片战争后的买办两者之间的联系和本质上的区别，买办保证制度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变化与继承关系以及买办转化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三篇拙文《明清广州中西贸易与中国近代买办的起源》《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和《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官僚——吴

健彰析论》<sup>[21]</sup>，皆从聂先生和汪先生的论著获得启迪和教益，而似乎与彭先生的大著在学术观点上有某些不同。然而学术为天下之公器，论学如同交友，应该和而不同。近读汪熙先生为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一书中译本写的丛书《主编前言》，文中有言；“虽然孔教授在本书中有很多好的见解，但翻译这本书，不意味着我们全部都同意他的观点。同样，我们也并不主张只介绍那些同我们观点完全一致的外国著作。我们若坚持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那就失去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意义，失去了切磋问难的机会，也就没有我们自己学术上的长进了。”<sup>[22]</sup>这种虚怀若谷、坦荡包容的治学态度，值得我辈后学取法。汪先生对外国学者的著作尚且如此，何况笔者所面对的是中国前辈学者的著作，整理校订梁先生和彭先生的著作，都是一种传承文化的责任：传承前辈学者的学问，推进十三行历史的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还须付出几代人的努力，为此必须寄希望于有志于学的青年学者，笔者愿意在其中发挥一点桥梁的作用。

此次校订对于本书内容略有增补者，一是在彭弘先生寄来及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查阅的多篇著者遗文中，选出《中英五口通商沿革考》，作为本书的第十二章；二是在附录《广州洋货十三行重要文献和档案资料辑要》之末补入嘉庆十年刊印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三是在彭弘先生寄来及在中山大学图书馆查阅的多篇著者遗文中，增入著者工作照、重要文献书影及有关十三行的图画、照片，使卷首图录从原来的3幅增加到13幅。

本书的校订，由笔者在2012年7、8月将书稿校阅一遍，排出清样，此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部沈展云先生安排，经叶惠明和谢尚二编辑各校阅一遍。而笔者按照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部安排，同年9月转入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新版的校注，直至2016年4月该书出版，又忙于《梁嘉彬史学文集》六卷的编校工作。至今年1、2月，将二校样校阅一遍。自9月15日至今，将本书重读一遍，对内容略作增补并写成此文。2018年三校样出来后，还须再校一至二遍，争取在当年出版。

读了彭弘先生为父亲写的传略，笔者联想到自己的父亲。父亲生于1916年，与彭先生同年。父亲自幼聪颖，祖父在六个孩子中，只让他一人读书。1923年，祖父不幸去世，祖母守寡将六个孩子抚养成人。七岁的父亲从此失学，命运为他安排的，不是当

搬运工人，就是当码头工人。在彭先生就读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岁月，父亲正在香港荷里活道一家柴炭店，做着挑柴送炭的杂工。2003年秋天，笔者赴香港大学参加学术会议，黄昏时从太平山半腰下榻的旅馆走到中环海滨，又从中环返回旅馆，途中在昏暗的街灯下，见到路牌上“荷里活道”四个字，令人眼前一亮。从小学三年级起，笔者多次为父亲填写工作单位汕头港务局装卸大队发下的履历表，“香港荷里活道合兴柴炭店杂工挑柴，”是一道挥之不去的记忆。直到日寇占领香港，父亲才逃难返回汕头。那天晚上，天下着微雨，笔者在荷里活道的街上不停地走着，直到深夜，体验父亲当年的艰辛，走完靠近中环的一边，又走上靠近太平山的一边，眼眶含着泪水，雨水湿透了衣裳，湿透了头发，从额角流入眼眶，与泪水融在一起，……2015年12月，笔者又到香港大学，参加饶宗颐先生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又来到荷里活道，追寻父亲的遗踪，走着父亲当年走过的石板路，踏上父亲当年走过的石级，在父亲当年乘凉的老榕树下徘徊，到父亲当年拜祀过的妈祖庙拜祀，献上一点香油钱，向坐在路边石凳上八九十岁的长者探访，希望能追寻到当年的一点记忆，……2016年12月，笔者到澳门科技大学为学生上通识课，未能返回汕头，到鸥汀祖祠拜祀祖先父母，遂在大潭山下旅舍写下《荷里活道思亲》一文，纪念父亲的百年诞辰。文中最后写道：“1970年，二十八岁的长兄文闲不幸去世。1974年，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父亲也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只活了五十八岁。父亲在弥留之际对我说：‘人生几十年光景，过得好一点苦一点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问心无愧。我这一辈子就是问心无愧。’这是一位勤劳朴素、善良正直的父亲留给儿子的宝贵遗产。”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使一个人，哪怕是平凡世界的人，活得有人格，有尊严，生命走向终结，精神永远长存，细流汇入江河，江河流入海洋，融汇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彭弘世兄能读父书，为本书的校订尽心尽力，彭先生在《序言》中已经道及。对笔者的要求有求必应，多次寄来论文资料，寄赠彭先生巨著《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大册，且能体谅笔者的苦心，从无催迫之意，令人感佩至深。

从读彭先生十三行研究的论著，到承乏本书整理校订之责，不觉三十余年，笔者也已从青壮年进入老年。本书虽不能在2016年彭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出版而不无遗憾，然而作为先生著作的第六种，学术专著的第三种，这部中国学者关于十三行研究的重要著作，终于在先生青年时代求学之地广州出版，先生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欣慰。



注 释:

- [1] 穆福田原文载《人民日报》1983年8月10日,引文见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2。
- [2]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页3。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聂宝璋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页370~371。此书为聂先生2003年1月题赠。
- [4] 杜恂诚《汪敬虞先生学术传略》,杜恂诚、陈争平、朱荫贵、林刚等著《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页14~15。2008年春节汪先生题赠。
- [5] 彭弘《彭泽益传略》,载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13。
- [6]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第20页。
- [7] 彭弘《彭泽益传略》,载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页210。
- [8] 彭弘《彭泽益传略》,载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页210。
- [9] 李士楨《李大中丞政略·抚粤政略》卷六《文告》,页55。
- [10]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序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页4。此书为彭弘先生寄赠。
- [11] 见本书页120。
- [12] 见本书页125。
- [13] 其中如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为1980年以来相关成果的结集。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范岱克《广州贸易》(*The Canton Trade*),2005年香港版;《广州和澳门的商人》(*Merchant of Canton and Macao*),2011年香港版;《广州和澳门的商人续编》(*Merchant of Canton and Macao*),2015年香港版等。
- [14] 见本书页161-163。
- [15] 见本书页165-166。
- [16] 章文钦笺注《澳门诗词笺注》,澳门政府文化局、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明清卷》,页68~69 屈大均诗。
- [17] 拙著《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页433。
- [18] 即此书第三版,199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聂宝璋集》，页371。

[20] 见本书页158。

[21] 后来都收入拙著《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见该书页1~144。

[22] 孔华润著、张静尔等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卷首页2。此书收入汪熙主编《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第4辑。

2017年11月10日凌晨6时初稿于广州河南康乐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